

浅析南宋待阙官群体对士风的影响

刘济铭

云南大学

[摘要]目前关于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研究大多是依附于对宋代冗官、科举制、个人仕途等相关议题，缺少对其专门性的研究。对于其在待阙期间的具体社会活动和思想层面的变化，学术界并未有较针对性地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待阙官的精神面貌进行细致地研究，在把握宋代待阙官制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社会生存情况，进而分析探讨待阙官员作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其精神面貌的变化对士风的影响。

[关键词]员阙矛盾；士风；待阙官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1693

宋人笔下的待阙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与待次含义相同；其二是为参选。本文所要研究探讨的宋代待阙官，主要是指那些已授差遣职阙正等候现任官离任的官员。随着科举取士的范围越来越大，员多阙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待阙成了大多数中下级官员甚至是朝官仕途升迁绕不开的环节。对大多数普通官员来说，受到宋初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影响，能顺利跻身科举，一展自己的政治宏图，可以说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愿望。为了打发自己待阙期的空闲时间，士人群体会进行各种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凭借自身较高的文化素质造福一方，对其所在地方士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其生活状况在看似清闲的背后，也有着急躁烦闷的复杂情绪，他们的心态也会被经济、仕途、社交等各方面打破。官职迟迟没有空缺，仕途晋升的希望渺茫。产生从壮志凌云到因漫长的待阙期而变得孤独寂寞、焦虑失落、苦闷焦躁等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这种精神上的煎熬往往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令人痛苦。其精神面貌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一些待阙官为了尽快求取阙位或者得到佳阙，四处奔走行贿。总而言之，随着冗官的增多，员多阙少的问题不断突出，待阙官逐渐占据了士人群体的大多数，其间不同的精神面貌都对南宋士风变化产生了很大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南宋前的待阙官及其概况

据史料获悉，宋代官员的职官制度已相当成熟，从选官、除授、任职、考课、俸禄、黜降、迁转、致仕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条文规定。据《长编》卷十二载，开宝四年（971）二月，“诸道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太平兴国时，宋太宗在诏书中亦云：“今封疆尽辟，县邑猥多，动皆缺员，历年未补。”直到真宗咸平年间，还曾下诏曰：“如闻州县阙多员少，可选朝官，各举所知，以补员阙。”在经历了连续战乱后刚刚建立起的统一政权，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宋王朝急需选拔大量忠诚而有才干的官员来打理王朝上下的各项事务。

后来，宋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陆续通过扩大恩荫补官、科举取士、流外入仕、杂色补官等各种入仕途径，让更多人参加政权，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于是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员阙矛盾也就渐渐凸显出来。赵宋王朝是出现了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冗官现象。追根溯源早在北宋建立初期，设官

分职，阙多员少，任官未冗。史籍里记载中的待阙、待次更多是从北宋中期开始。范仲淹曾上奏言：“在京官司，有一员阙，则争夺者数人。其外任京朝官，则有私居待阙，动逾岁时，往往到职之处，便该磨勘，一无勤效，例蒙迁改。可见，官员数量不断增加，而职阙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员多阙少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官员待次、待阙问题。

在员阙矛盾刚刚凸显，待阙官还未有如此庞大的人数之时，通过朝廷各项政策的扶持，大部分待阙官的生活条件虽算大富大贵，但大部分人足以温饱。据史料记载在待阙期间，政府会允许官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在京城、家乡或者其他地方州县寄居待阙。此外，宋代待阙官所担任的临时性职务也较为多样，如担任考官、坑冶检踏官、押纲官、权摄官等。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风

要分析士风，首先是要解释“士”。“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不同的面貌出现，即每一时代的“士大夫”又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一代代士的转型既是士自我认识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自命为士的社会构成的转变。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而士风，即指士人的风气，涉及士人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它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风尚。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

继范仲淹后朱熹总结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在士大夫群体之间广为传播，激发了一代士人的理想和豪情。用现代观念作来讲，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人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有直接参与的资格，成为“士”的集体意识，而不只是少数理想极为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定义宋代就是士的黄金时代，但是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君王到大臣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因此本文将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为研究对象，论述南宋时期待阙官群体的思想和社会活动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的影响。

三、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社会活动对士风的建设性作用

（一）承前启后，继承发展北宋的士大夫之风

南宋时，员多阙少的矛盾更为激烈，有史料记载“诸州通判佳阙处，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因此大多数的基层官员都很难得到相应的职务，官员待阙年限亦逐渐延长且变得更为严重。这一庞大的群体在地方待阙闲居期间并不是无事可做，其也会根据自己自身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参与到地方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等活动中，造福一方，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例如在乾道四年（1168），朱熹在建宁府崇宁县待阙闲居期间推行社仓，每逢灾荒期间对灾民进行救济，在此后逐渐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由此观之，在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是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之时，朝廷会要求地方的待阙官们临时性地参与相关工作，待阙官也会自愿主动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中。对大多数普通官员来说，受到宋初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影响，能顺利跻身科举，一展自己的政治宏图，可以说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愿望。但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居家待阙闲居，在漫长的等候阙位中度过。而宋代士大夫从整体而言，占据其价值取向主导地位的是“承当天下事”。这些自发组织或者是临时性安排的工作让处于待阙期间的官员有了能够躬身入局的机会，提高了其作为士大夫的社会参与感、责任感，进一步巩固了士人群体的共识与追求，强化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意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官员在漫长的待阙期间逐渐沮丧、失去信心的速度。

（二）文化下移，促进士风文化在市民大众中的普及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三月，朝廷下诏：“出卖没官等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挥，监司、州县官吏、公人并不许收买外，其寄居、待阙官愿买者听。”这一政策不仅反映出朝廷为了解决官员在待阙期间的俸禄生计问题不断出台调整相应政策，亦得知待阙官在寄居地买田是不受禁止的。根据《夷坚志》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14），王得金少卿钰，曾寄居在平江横金市，待行在粮科院阙。其在横金市的西南处鲁都湾，有数百亩田产。这种殖产兴业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又是文化下移现象不可忽视的原因。此外，从事教书活动也是官员在待阙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样既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又可以兼顾到自己的学业。淳熙年间，孙应时在待阙期间又先后在绍兴学府，四明东湖书院等地进行教书。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待阙期间从事商业活动还是选择教书活动，都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融合，“士”群体不再是高居于庙堂之上的贵族或者官僚，他们逐渐深入到社会各个社会群体中，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士风文化在市民大众中的普及，具体表现为文学重心逐渐下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待阙官作为介于普通市民与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僚之间的群体，起到了一个文化传播纽带的作用，他们将士大夫作为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审美情趣带给普通市民大众的同时又

受到普通市民大众的影响，开始从事一系列商业活动，助力商品经济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促成了士风文化在市民大众中的普及。

四、南宋时期待阙官的社会活动对士风的消极一面

在待阙官生活状况在看似清闲的背后，也有着急躁烦闷的复杂情绪，他们的心态也会被经济、仕途、社交等各方面打破。官职迟迟没有空缺，仕途晋升的希望渺茫。产生从壮志凌云到因漫长的待阙期而变得孤独寂寞、焦虑失落、苦闷焦躁等一系列的情感变化。其精神面貌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一些待阙官为了尽快求取阙位或者得到佳阙，四处奔走行贿或是利用自己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谋求甚至抢夺阙位。理宗时杜范奏言：“夫一官而三人共之，苏轼固尝言于熙宁间矣。以今之天下较之熙宁，十无三四，土地日蹙，阙次日远，固有一官而五六人共之。差注不行，参选淹滞。”可见此时员多阙少的矛盾比北宋要严重得多。长此以往，在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待阙官要想获得职位，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一系列不成文的潜规则，若想跻身仕途，能做的无非就是接受或者是直接放弃。

当然，我们不能说待阙官为了获得阙位而去奔走权门就导致了南宋时期士风不如北宋时期的整体趋势。在当今研究中，学者总是将冗官冗员问题作为研究南宋士风处于不断下滑趋势的原因之一，其中待阙官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其间稍有一点逾矩的行为，便被列为始作俑者之一。但是，与其将这部分待阙官看作成使士风走向衰败的助推者，不如将其看是冗官冗员问题逐渐突出的情况下的受害者。

在整个腐败的政治大背景下，利与义往往不能兼得。因此不论待阙官选择继续在官场沉浮或是退居避世，都与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相差甚远。

结语

待阙官出现是宋代职官制度实际运行下的产物，对待阙官的研究也是我们分析不同历史时段士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能够从侧面体现出更多丰富的历史信息。针对南宋时期待阙官对士风的影响，其中既有继承发展宋初士风的积极部分，又有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及个人选择而不可避免产生的消极部分。但是，不论如何，南宋时期的士风确实部分偏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以一种衰败的整体发展态势伴随着南宋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108页。
- [2] 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48-63页。
- [3] 梁庚尧：《南宋的贫士与贫官》，《台大历史学报》1991年16期，第91-137页。
- [4] 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三期，第102-116页。